

由“困”字论及《周易·困卦》

白兆麟

摘要:从汉代许慎、扬雄到清代段玉裁、朱骏声对“困”字的种种解说,正是“困”字由本义而逐渐延展开来的一系列引申义,其间有着各种或显或隐的联系。《周易》“困”卦之主旨在于强调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即不因困顿而丧失意志,反而应当奋发有为、革旧创新。

关键词:“困”;《周易》;哲学理念

《礼记·学记》云:“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

“知天命”之年,我给自己的书斋命名时,脑际油然浮现上述那几句至理名言。的确,只有知道自己知识不够,才能自我反省;只有知道自己教学上有解说不通之处,才能加强自身的学习。随即取名为“困庐”,以此概括我的教学生涯。

为探寻“困”字的本义,又专门翻阅东汉文字学家许慎所撰之《说文解字》。许慎云:“困,故庐也。从木在口中。柴,古文困。”许氏不仅解说了他所理解的“困”字的本义,而且还列出了该字的古文字形。清代说文大家段玉裁为之注云:“困之

本义为止而不过,引申之为极尽。……凡言困勉、困苦皆极尽之义。”^①段氏根据“困”字古文形体,对其本义与引申义另作了一番解释。看来,许氏“故庐”之说解与书斋之名倒是十分贴切;而段氏所注“困勉”之引申义却道出了“困庐”的深意,所谓“自强”“困勉”即迎难而上、不断勉励自己也。不仅至圣孔子有“困而学之”的劝勉,而且亚圣孟子亦有“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的议论。大凡有志向的文人学士,心虑遇到阻碍反而能够奋发而有所作为是矣。

不止如此,“困”字还有其他诸多妙解。《广韵·恩部》:“困,悴也。”西汉学者扬雄所撰《方言·一三》:“困、胎,逃也。”清代另一说文大家朱骏声所著《说文通训定声·卷一五》:“困犹隐居也。”把以上那些解说串联起来颇耐人寻味:凡遇阻碍不通则心力交瘁,心力交瘁则欲设法避开,摆脱困扰而隐居即能求得清静。

“困”字既有穷尽极至之义,又隐含物极必反之义。《国语·越语》所谓“日困而还,月盈而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综合起来,从汉代许慎、扬雄到清代段玉裁、朱骏声对“困”字的种种解说,正是“困”字由本义而逐渐延展开来的一系列引申义,其间有着各种或显或隐的联系。“困”字之义深矣,国学之魅力大矣!

转眼至“从心所欲”之年,我从指导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博士生的教学岗位上退下来,即为自己确定了一项使命,那就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时机,继续传播与张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与严格意义上国学相关的经典文献的论析。其中因缘,除了长期以来所从事的专业教学所形成的思维定式之外,主要是面对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下中国,在经济和社会获得进一步发展与繁荣的背后,业已出现的各种所谓“文明病”或“现代病”,与物质财富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步存在的,是整个社会中传统流失、价值失范、理想沉沦、物欲泛滥、市侩横行的现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物质与精神、利益与道义、个人与群体的普遍失衡。当人们切实感到原有的意识形态不足以抚慰心灵的时候,却发现包括国学在内的民族传统文化往往能够提供精神的家园,自觉而良好的人文精神可以促使人们头脑清醒、目光远大、情

①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感丰富,因而具有责任心和使命感。

于是在自己的“困庐”书斋里继续钻研并撰写有关《易经》《老子》《论语》等古代经典的论述文章,而涉及《易经》的就有4篇。^①其中《关于〈易经〉的再思考》一文因刊载于美国的中文报刊,国内读者不易查阅,有必要重申一下,以便理解后面要论析的《周易·困卦》。

二

《易经》本名《易》,曾历经三个阶段:其一是《易》的自然形态,当为原始初民观察自然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二是哲学形态,当由孔子整理,且吸收老子哲理而形成的哲学理念;其三是阴阳形态,即经过阴阳家改造,掺进了原始迷信的消极观念。时至今日,科学地解读和研究《易经》,首先要明了它有一个从自然到哲理的过渡,即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易经》,二是《易传》。这正是《易》之演变的前两个阶段。至于第三阶段,那是在东汉王朝前后,阴阳家利用原始巫术将“自然易”曲解为“卜筮易”,即纯粹用来占卜吉凶的所谓“易”。我们应当剥离其中非科学的成分,凸出其合理的内核,使这部经典得以发扬光大。

《易传》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这就说明,《易》之“八卦”起源于初民对天地万物的观察。“象其物宜”,“观其会通”,即在那洪荒草莽时期,初民体悟到天地万物变化的根本法则和初始规律,开启“道法自然”的宇宙观。所谓“八卦”,是由一长杠(一)和两短杠(--)相互叠合而构成的八个抽象符号,实际上是八种自然物质的代表,即天地、风雷、山泽、水火。《易经》包括其《传》在内,有所谓卦画、卦象、卦辞、爻辞的内容,其本源于自然,是由对自然的“观(察)”与“(抽)

^① 这4篇是:《试论“国学”的三个层面》(《学术界》2007年第3期),《关于〈易经〉的再思考》(2011年12月《海华都市报》),《易经之“气”与老子之“无”》(《睇睨集》,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版),《〈易经〉之重言叠字辨析》(《白兆麟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

象”而产生的,其卦爻辞是对“象”之意义的解说。可见,占卜并非《易》的源头,而是《易》的运用。《易经》的基本原则在于“道法自然”,换句话说,其根本精神是效法自然。

说到这里,有个疑问需要解决,为何卦象不由二叠而都由三叠组成?有关专家学者解说各不相同,其中不乏精彩之处,也帮助读者解决了一些疑惑;但对上述问题似乎尚未完全摆脱《系辞传》的消极影响。^①

按照笔者的想法:其一,从求神问卜以解疑释惑的角度来思考,“三”是去从不定、取舍待判时而出现的决定者,所谓“三占从二”,只有三次贞问才能决出可以放心的多数来。其二,从组合的角度来思考,长杠“—”和短杠“--”之两两叠合,只有四种可能性,可供选择的余地很小;如果是组成三叠,则有八种可能性,选择的余地增加了一倍。其三,再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无论中外,古人都对数字“三”给予关注,《史记·律书》云:“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古希腊学者也说:“我们称二为‘双’不为‘全’,说到三才说全。”^②即使按照传统文化来思考也能够讲通:儒家常以“天、地、人”三者并举,“人”处第三而介于“天、地”之间,“天”与“地”对立,通过“人”的中介,天与地就调和统一了。道家始祖老子亦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意思是说:事物有规则的运动创造了宇宙本体(道生一);这个本体一分为二,成为阴和阳的对立统一(一生二);这种新事物是千姿百态、多种多样的(三生万物)。可见“三”在中外古人的心目中都是个奇妙的数字。

《周易·系辞传下》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所谓“象”,本有“拟象”(模拟)、“法象”(类比)等多种含义。魏时学者王弼注释《周易》云:“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这说的是在“模拟”“类比”之外,还存在以有物之境表虚无之理的象征意义。

总而言之,《易经》中的八卦及由此推演的六十四卦的意象以及一系列解说,

① 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金景芳先生等所著《周易全解》一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该书值得参考。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综合性地反映了上古社会逐渐推进的历史和汉民族早期认识逐渐深化的概貌。尤其是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六十四卦及其卦爻辞,曲折地反映了更为具体而复杂的排列组合如何才能算作优化的哲学理念,并由此展示其宇宙观及其学术演绎。其中所显现的自然界物质的错综结合,与人类生活、生产密切相关,初民们凭借自身的想象力,逐渐积淀为某种错综复杂的“意象”——想象系统。究其实质,它是上古时代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符号,由物质之意象转化为文化之意象。不难看出,其中有着古老中国早熟的大陆式农耕经济的背景。^①

有了以上的总体认识,我们就可以专门讨论《周易》六十四卦之一的“困”卦的哲学理念及其现实意义了。

“困”卦的符号为“䷮”,是由八卦之“坎”在下、“兑”在上组合而成。“坎”卦代表水,“兑”卦代表泽。按照常理,水在泽下,自然是泽中干涸无水之象,正是困乏的表现。其卦辞却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困”是困乏、困顿,而“亨”是亨通,卦辞以亨释困,这是为何呢?其下用来说解卦辞的“彖传”曰:“困,刚揜也。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贞大人吉,以刚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②

从卦画的角度来看,所谓“刚揜”是指兑卦为阴而在上,坎卦为阳却在下,阳刚为阴柔所掩蔽,隐含君子为小人所围困。所谓“险以说(脱),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正是针对卦辞“困,亨。贞大人吉”所言,其意是就卦之德性而言,坎卦之德“险”,而兑卦之德“说(脱)”,由于处险境却能致脱,岂不是开始困顿而后亨通么?不过,这是有条件的,即“其唯君子乎”,也就是说只有君子处困境而能亨通。孔子就说过:“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至于“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显然是说

① 白兆麟:《关于〈易经〉的再思考》,2011年12月《海华都市报》。

② 参见《周易全解》有关论析。

人处于困境,任凭你如何“尚口”会说,都不会取得信任,摆脱困境的最好办法是凭靠行动,否则仍“穷”,即走入死胡同。其结论是“贞大人吉”,“以刚中也”。所谓“刚中”,意谓刚正之君子身处困境之时犹能善守正道,最终“无咎”而得吉。这与下面的《象曰》所说“君子以致命遂志”正相吻合。

笔者数年前曾撰有《〈易经〉之重言叠字辨析》一文,其中解说《困卦·九四》“来徐徐”一语时有一段按语:“‘困卦’之‘困’,含有疲惫困穷之义。对待困穷有两种不同的态度。《论语·卫灵公》即云:‘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象》亦曰:‘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孟子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其最好的注释。‘徐徐’,迟缓貌。君子道困,当审时度势,徐徐而来,从容以对,量力而行,自然会‘有终’‘遂志’。”^①

“困卦”本身的哲理已如上述,那么在今日对我们有着什么样的启示呢?这就需要置于《易经》之大格局中来理解。

《易经》本身就是变化的哲学。其《系辞》即云:“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而谓之事业。”又云:“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所谓“变通”,即爻象之往来上下,刚柔变动,趋利避害,成就事业。所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说事物发展到极尽之时即需变易,变易才能通畅,以保持发展的势头而延续。

《周易·系辞传》有3处提及“困”卦:“困,德之辨也。”“困,穷而通。”“困以寡怨。”^②所谓“德之辨”,讲的是应对“困”的态度,即身处困境,德之深浅自然可辨,需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磨炼自身的心志。所谓“穷而通”,讲的是摆脱“困”的原则,即身处困境,依然要坚守正道,凭靠积极的行动来开创新的局面。所谓“寡怨”,讲的是解决“困”的方法,即身处困境而不怨天尤人,临危不乱,守节不移,想方设法,转困为通。

《周易·系辞传上》明确说:“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如此说

① 白兆麟:《〈易经〉之重言叠字辨析》,见《白兆麟论文集》。

② 金景芳等:《周易全解·系辞传下》。

来,对于“困”卦也有“形而下”和“形而上”两种不同层面的解说。就“形而下”之层面而言,“困”卦所言是关乎人格的培育与建构,即帮助人们陶冶情性、健全人格;就“形而上”之层面而言,“困”卦之主旨显然在于强调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即不因困顿而丧失意志,反而应当奋发有为、革旧创新。如前所说,当今社会面临诸多“文明病”或“现代病”,这是改革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我们应当树立《周易·困卦》所说的正确人生观,善守正道,推崇变易,从容不迫,“致命遂志”,始终“鼓天下之动”,义无反顾地“推而行之”。

(白兆麟: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大学文学院,合肥 230039)

传说殷商灭亡后,箕子率众到了朝鲜。据史书记载,汉武帝以后,朝鲜半岛上的百济、高句丽、新罗诸国都全面吸收汉字文化。汉字词在朝鲜语词汇体系中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功能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朝鲜历代王朝也都非常重视汉语的学习。公元4世纪,百济国高兴以汉文修成百济史《书记》;高句丽自建国初期起,即用汉文撰修本国史籍。新罗在中国南北朝时期,以汉文撰成国史。8世纪中叶,新罗太学监定《论语》《孝经》为必修课。1276年,朝鲜高丽王朝设置了同文馆(后改称司译院),培养以汉朝翻译为主的各类翻译人员。1393年建立的李氏王朝又设立“汉学”,制定了《训民正音》,1459年编有会话课本《老乞大》和《朴通事》。汉学家崔世珍编有《训蒙字会》,金搢编有《汇语》,退溪李滉和眉岩柳希春编有《语录字义》和《语录解》。1690年司译院刊行有《译语类解》,还出版了《同文类解》《蒙语类解》《汉清文鉴》等以汉语为词目的汉语—朝鲜语—蒙语、汉语—朝鲜语—满语的多语对照词典。1691年刊行李景羽编的《玉汇韵考》,1778年刊行洪命福编的《方言集释》,1789年刊行李义凤编撰的《古今释林》,1796年刊行李德懋和徐向膺等编的《御定奎章全韵》。

《训蒙字会》集字典与蒙学课本于一体,收释3360字,分上、中、下3卷,每句4字,谐音类聚,分成33项。上卷有天文、地理、花品、草卉、树木、果实、禾谷、蔬菜、禽兽、鱼贝、歇虫、身体、天伦、儒学、书式等,中卷有人类、宫宅、官衙、器皿、食饌、服饰、舟船、车舆、鞍具、色彩、布帛、金宝、音乐、疾病等,下卷为杂语,多为日常生活用字。

《汇语》是一部仿王应麟《玉海》编成的百科全书式类书,59卷60册。分万物门、人伦门、儒道门等17个门类,下再分为629条2819目,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语录解》是解释宋时的口语俗语词语的系列辞书,《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辞典》被称为朝鲜中期最早刊行的中国俗语辞典,^①以“一字类,二字类……”进行分

① 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辞典编纂部:《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辞典》Vol.14,第873页“语录解”条,韩国熊津出版1993年版。

类,相当于学习宋代口语的应用型词典。旧本出于李滉门人所录,多为随手而记,郑澐(1600—1668年)曾作有补充,收释了《朱子文集》《朱子语类》《近思录集注》和《心经附注》等宋明儒家文献中1050个词语,其中多为唐宋以来的口语词和俗语词,如“合下、伶俐、怎生、头当、照管、巴鼻、家事、领略、到头、悠悠、作么生、担板汉、不多时、大小大、信得及、信不及、无缝塔、不奈何、动不动、石尤风、朴实头、下梢头、一绰过、做将去、一副当、大拍头、捺生硬”等。宋浚吉与南二星又加以厘正,在显宗十年(1669年)所撰《语录解跋》中说:“《语录解》者,即中国之俚语,昔有宋诸贤训诲后学与书尺往复率多用之,盖欲人之易晓尔。顾我东声音言语谣俗不同,反有难晓者,此《解》之所以作也。”指出:“辞语疑晦之间,或可以此书解之。而既解其言,又必体之于心,行之于事。然则此解虽微,亦可为摘叶寻根,沿流穷源之一助。”韩国汉城大学校的奎章阁藏有心斋白斗鏞编纂、鹤巢尹昌铉增订的《注解语录总览》两册,其中“语录解”部分出于17世纪李退溪门人之手,辑录退溪李晃和眉岩柳希春对《朱子语类》中俗语和口语的解释。如“打乖”,除列出了“怪异”“乖僻”等义项外,还指出“南人聪明性悟者亦谓乖”。语录解体例大同小异,今以郑本为例略作说明。①全书收词共1182条,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语录解”,收词946条。第二部分为“汉语集览字解”,收词64条。第三部分为“附录”,收词172条。第四部分为“跋文”。②词目以字数为序排列,分一字类、二字类、三字类、四字类、五字类、六字类共六类。③释义既有全用汉语解释,也有全用韩语解释,又有混用汉韩双语解释。释义方法有同义词对释、下定义、举例等。④注音多采用韩语,也有用汉语直音的。对多音字则注出该字所在语境中的读音。

《译语类解》相当于词汇注释词典或词典式词汇集,以汉语、朝鲜语对译的形式编纂,分上、下两卷。上卷分天文、时令等43门类,下卷分珍宝、蚕桑等19门类,把具有类似语义的词汇按语义类型进行分类,共收释词语4781条。每条先写汉语词,再用韩文标记单字的汉语音,最后用训民正音标记词的意义。1775年金弘哲又按其例编有《译语类解补》,补收了1100多个词语。

《玉汇韵考》编排独特,将阴时夫《韵府群玉》和李景羽自己所撰《韵考》分置于

书的上下两端,以方便查检对照。《御定奎章全韵》则是朝鲜时代集大成的韵书,参考了宋代吴棫《韵补》、明代章黼《韵学集成》和杨慎《古音略例》等,按 106 韵编排,收录 13345 字。

《古今释林》共 40 卷,分别国方言、历代方言、洛闽语录、道家语录、释氏语录、传奇语录、华汉译语、东韩译语、三学译语、四夷译语、元明吏学、罗丽吏读,共 12 部分。李义凤《小题》称“始阅《朱子语类》及四书小注,苦语录难解,有人授以郑抱翁编溪门《语录解》,不啻昏衢之烛,而又患所解之不广,傍搜《朱文割疑》、《近思》、《心经释疑》、退栗文集及《字汇》、《字典》、《礼部韵》等书而增释之”,后又广之以扬子《方言》和汉唐宋儒道释,续之以汉语及外夷土音,吏读译语杂释中的方言和语录,“仿《尔雅》而广其目”。如释:“措大,士也。《书言故事》:穷措大,眼孔小,与钱十万贯,塞破屋子矣。《资暇录》:俗谓士流为醋大,言其峭醋而冠四人之首。愚按醋宜作措,言其举措大事也。”^①释:“心曹,《侯鯖录》曰:愁,忧也。《集韵》音曹。扬雄有《半牢愁》,音曹。今人言心中不快为心曹,当用此愁字,即忧也。”^②

李湛等编《汉清文鉴》是汉语、满语、朝鲜语对音辞书,15 卷,1776 年据清代 1772 年刊行的《御制增订清文鉴》(46 卷 48 册)编成,收录汉语词语 12000 多条。

《康熙字典》东传朝鲜后,朝鲜时期还编有《全韵玉篇》《字类注释》和《奇字汇》等。《全韵玉篇》约编于 1796 年,^③作者不详。分上、下两卷,凡 214 个部首,部首按笔画排列,共收字 10908 个。每字头下先注韩音,有时先标出该字头是正是俗并标注韩音,后用汉语释义。如遇一字多音多义,则在每义下注明该词所属韵部以示区别。1915 年柳瑾编的《新字典》将《全韵玉篇》的古汉语注释用朝鲜语又重新作了解释。《字类注释》为郑允容编于 1856 年,收录 10965 字,分上、下两卷,按意

① 退栗文集似指李滉(退溪)和李珥(栗谷)的文集。李义凤:《古今释林》,亚细亚文化社 1977 年版,第 501 页。唐李匡乂《资暇集》卷下【措大】:“代称士流为醋大,言其峭醋而冠四人之首。……愚以为四说皆非也。醋宜作措,止言其能举措大事而已。”明顾氏文房小说本。

② 李义凤:《古今释林》,亚细亚文化社 1977 年版。[宋]赵令畤:《侯鯖录》卷八:“愁,音曹,忧也。《集韵》:‘扬雄有《伴牢愁》,音曹。’今人言心中不快为‘心曹’,当用此‘愁’字,即忧也。”

③ 《全韵玉篇》,韩国国民文化社 1998 年影印出版。

义归类,以韩汉双语诠释形音义。^①《奇字汇》把《康熙字典》收录的古文整理成册,收 2122 个异体字,每个异体字附有相对应的正字,作者不详。19 世纪还刊行有《华语类抄》,全书分天文、地理等 63 类,收 2148 个汉语词,每个词条都用朝鲜文对译。

朝鲜辞书往往以《玉篇》《字林》和《字典》命名,如 1908 年郑益鲁编有《国汉文新玉篇》,1909 年池锡永编有《字典释要》,1913 年玄公廉编有《汉鲜文新玉篇》,1921 年刘汉翼编有《字林补注》。《国汉文新玉篇》以《全韵玉篇》为底本,增补了一些日常实用字和韩语的读音等,按 214 部首编排,以韩语注释音义。《字典释要》《汉鲜文新玉篇》和《字林补注》都以《康熙字典》为样本,字音和诠释也用韩语标示。^②柳瑾编的《新字典》凡例亦称“此书用《康熙字典》为台本,剪其繁衍,补其阙漏,兼收新制之字、新增之义,以应时代之用,故名曰《新字典》”。

近年来又有朴在渊编《中朝大辞典》^③和河永三编《汉字字源辞典》等。《中朝大辞典》,正文 8 卷,索引和附录 1 卷。其中摘录了包括《语录解》在内的 230 多种 1000 多部典籍的内容,共收录汉字 12814 个,词语 69352 条,例文 425918 条。每个字的诠释都有字头、词目、注音、释义、例文五部分。字头以汉语拼音字母和声调顺序排列,同音同调的再以笔画数为序,笔画数相同的以部首为序。字头下面是复词,如在“阿”下面共收阿、阿鬟、阿茶、阿呆等复词 51 条。“家”下面共收家邦、家边、家财、家产、家常、家臣、家乘、家成业就、家丑不可外扬、家畜、家大人、家常、家荡、家道、家牒、家督、家法、家翻宅乱、家反宅乱、家风、家蜂、家鳧、家府、家父、家父家母、家富小儿娇、家公、家怀、家话、家伙/家火、家鸡、家鸡鱼、家什、家家、家间、家教、家姐、家具、家春、家君、家口、家老、家狸、家里、家里无银莫做官、家鹿、家门、家庙、家奴、家奴诉良、家贫、家谱、家亲戚、家亲外祟、家庆、家雀、家人、家人共犯、家嫂、家舍、家生、家生孩儿、家生儿、家生哨(儿)、家生子、家生子(儿)、家事、家世、

① 《字类注释》,韩国建国大学校 1974 年影印出版。

② 参见黄卓明:《朝鲜时代汉字学文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版。

③ 朴在渊:《中朝大辞典》,韩国鲜文大学校 2002 年版。

家贵、家室、家书、家书直万金、家塾、家属、家数、家私、家堂、家堂神、家僮、家头、家徒四壁、家问、家下人、家乡、家小、家信、家兄、家学、家学渊深、家训、家雁、家爷、家业、家茔、家缘、家缘家计、家东、家长、家中宝、家主、家主婆、家庄、家贵、家资、家尊等 108 条。每条词目,先是用汉语拼音字母注音,接着释义,而后是例文。如“白璧入赵”：“指蔺相如完璧归赵事。”又举《型世言》例：“知君固是柳下惠，白璧应完入赵邦。”《汉字字源辞典》收录汉字 5181 个，诠释由标题字、字解和字形三部分组成。标题字包括代表字形、训读、简化字、异体字、汉语拼音、部首和笔画等，字解包括六书结构、本义和引申义等，字形则以甲骨文、金文、陶文、帛书、汉简、小篆、俗体等顺序排列。

日本的辞书也源于中国，日本辞书的编写无论形式还是内容皆受到中国各种辞书的强烈影响，两国文字和辞书一脉相承。^①《尔雅》、《说文》、《玉篇》、《字林》、《切韵》、《一切经音义》、《正字通》、各种版本的《康熙字典》等相继传入日本，后来的日文辞书基本沿用了这些辞书的编排体例和编纂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序称：“东洋文化，大半是靠汉字汉语来表现的。这在文艺方面、思想方面、甚至于在道德和宗教方面都是一样。因此，如果不研究汉字汉语来谈东洋文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编纂辞书可以认为就是揭开这种宝库的一种方法。”^②中日交流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其中遣唐使的贡献巨大。他们将中国书籍带回日本，对日本的社会、文化、语言诸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书籍中有一部分是在中国问世后不久便传入日本，而在中国却渐渐失传。如梁释远年的《兼名

① 千野荣一《岩波讲座日本語・语汇和意义》中说：“我国辞书的历史，可以说是从在引进汉字的同时使用中国的辞书开始的。”岩波书店 1977 年版。

② 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日本大修馆 1955 年版。

苑》和唐释慧琳的《一切经音义》等。^①

日本辞书也往往以《尔雅》《释名》《玉篇》《字林》命名^②,如贝原好古编《和尔雅》(8卷),1694年刊行;贝原益轩编《日本释名》(3卷),1700年刊行;新井白石编《东雅》(2卷),1717年刊行。又如长享三年(1489年)编的《和玉篇》,大永四年(1524年)成书的《玉篇要略集》,宽永十五年(1638年)刊行的《新刊倭玉篇》,庆安四年(1651年)刊行的《新板新刊和玉篇》,明治九年(1876年)山东直砥编《新撰山东玉篇》,明治十年(1877年)市川正一编《汉语插入新选玉篇》,明治十八年(1885年)藤田善平编《万通字林玉篇》,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石川鸿齐编《明治字林玉篇大全》,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野村田次编《日本大玉篇》等。当时这些日本辞书编者是把《尔雅》《释名》等作为辞典的同义语使用,《倭玉篇》甚至成了汉和辞书的代名词。

日本早期辞书多以我国辞书为蓝本编纂,《玉篇》可以说是当时编写辞典的基本蓝本和依据。弘法大师空海于806年归国时曾带去《玉篇》,^③以此为蓝本于天长七年(830年)编成日本现存最早的辞书《纂隶万象名义》。《纂隶万象名义》30卷,收字16900多个,共分542部。部首编排,始一终亥,^④全照顾野王原书,字数也与唐封演《封氏闻见记》所记顾氏《玉篇》字数相符,注释基本保留了原本《玉篇》的

① 据筑岛裕主编的《古辞书音义集成》(日本汲古书院,1978—1981年),有奈良时代(710—784年)写本《新译华严经音义私记》、平安时代(784—1192年)初期写本《四分律音义》、平安时代初期写本《大般若经音义》中卷、院政时期(1086—1205年)写本《大般若经音义》中卷、石山寺藏本《大般若经字抄》、平安时代中期写本《妙法莲华经释文》、南北朝时期(1336—1392年)写本《法华经音义》、室町时代(1336—1573年)写本《法华经音义》[永和(1375—1379年)本]、室町时代写本《法华经音义》[永正十七年(1520年)本]、镰仓时代(1185—1333年)写本《字镜》(世尊寺本)、大治三年(1128年)写本《一切经音义》、天永二年(1111年)写本《孔雀经音义》、承历三年(1079年)写本《金光明最胜王经音义》、平安时代末期写本《香药字抄》、学习院大学藏本《伊吕波字类抄》、室町时代写本《音训篇立》、东急文库藏本《孔雀经单字》等。

② 《尔雅》在日本有很多版本,如“神宫文库本”“古逸丛书本”“影宗本”《尔雅》,还有《倭尔雅》等。

③ 日本复制原本《玉篇》卷第九末有“乾元二年”(759年),可能是唐肃宗时传入日本抄写的时间。

④ 其中有200多字不见于宋本《玉篇》,与《残卷》相应的部分有28字为《残卷》所无。在义训方面,《名义》所收义项远比宋本《玉篇》丰富,有不少义项甚至连《残卷》也没有。《名义》保存了原本《玉篇》的基本面貌,因而在释义方面也就保存了大量的中古以前字书义项以及汉人旧注,在收字方面保存了汉魏齐梁间流行的俗字,这两个方面对于现代辞书编纂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

面貌,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称“直当一部顾氏原本《玉篇》可矣”。所谓“篆隶”即改《玉篇》原来的楷体为篆书和隶书两种字体,然后注出所释字的反切和词义训诂,也就是“万象”“名义”所指“世界之万种诸相”和“体上之名称与义理”,而从方便日本人使用的角度考虑,删去顾氏《玉篇》中所引的经传原文及按语。

《新撰字镜》是日本平安时代末期僧人昌住撰写的一部字书。全书12卷,将注释佛经词语音义的《一切经音义》按照便于日本人使用的原则重新排列组合,并加入《玉篇》《切韵》等辞书的部分内容,既按偏旁部首排列文字,又取同类事物的名称编在一部。自“天部”至“临时杂要字”共立160个部首,凡20940余字。分天象(天、日、月、雨、风等部),人事(父、亲属、身、面部等),自然、动植物(山、谷、玉、田部等)三大部分。然后再按词义分类排列。既参考《玉篇》的释义,又学习《尔雅》的分类;既模仿了《切韵》的标音,又加注了“和训”。重言叠字以及联绵词又分别编录。义训大多来自玄应《一切经音义》《玉篇》和《切韵》等典籍。注重辨析异体字,随字区分形似字。卷末《临时杂要字》按意义分为10个部类计254条,辑录了各类事物名称和当时的日常用语,包括舍宅章、农业调度章、男女装束及资具章、机调度及织缝染事章、马鞍调度章、木工调度章、锻冶调度字、田畠作章、诸食物调饌章、海河菜章。其中有不少条目与敦煌通俗字书相同,可见二者之间的传承关系。^①日僧还模仿《一切经音义》撰有《大般若经音义》《四分律音义》《新译华严经音义私记》《法华经音训》《净土三部经音义》《孔雀经单字》等,佛经音义也是日本古辞书的重要内容。如僧人珠光所撰《净土三部经音义》承《说文》类部首字书,以汉字部首作为篇目编次,又有佛经音义体式的特色。

《倭名类聚抄》是日本最早的一部具有国语辞典特色的类书,又名《和名类聚抄》(简称《倭名抄》或《顺倭名》),源顺编,20卷,成书于日本平安时期承平年间(931—938年),其释文引用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小学典籍材料,包括诸多散佚已久的典籍。编排上与《艺文类聚》等相似,把汉语词汇根据词义分成天、地、水、岁、时

^① 张磊《敦煌通俗字书与〈新撰字镜〉比较研究》认为“敦煌通俗字书极有可能是《临时杂要字》的底本之一”。《敦煌研究》2010年第3期。

等32部,下面再加以细分为249门。如天部分为景宿、云雨、风雪三门。^①词目后标明出典、音注和解释,并用万叶假名标了和训。该书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收入了为数不少的俗语词和口语词。

承《篆隶万象名义》和《倭名类聚抄》,十一二世纪时法相宗学僧编成《类聚名义抄》。书名“类聚”取自《倭名类聚抄》,“名义”取自《篆隶万象名义》。该书乃汉日词典,总分为“佛、法、僧”三部分,所以又有《三宝类字抄》《三宝类聚抄》的别名。各部按部首编排,仿《玉篇》的部首分类,分成120部,收录汉字的正体和俗体,注以和训。

镰仓室町时期所编辞书也皆承传《玉篇》和《广韵》等。如《聚分类韵》仿《广韵》而成,《孔雀经单字》大部分内容直接抄录《广韵》。《倭译大广益会玉篇》(简称《倭玉篇》)是《大广益会玉篇》的和译本,最初也叫《假名玉篇》。根据《玉篇》的部首排列,^②以汉字为字头,用片假名注出日语读音,再加上日语注释,有的还加汉字注释。1444年东麓破纳所编《下学集》的书名中“下学”取自《论语·宪问》的“下学而上达”之意。收释约3000条日常词语,按意义分类,分为“天地、时节、神祇、人伦、官位、人名、家屋、气形、支体、态艺、绢布、饮食、器财、草木、彩色、数量、言辞、叠字”等18门类,词条以片假名注出读音,用汉字简单注出语源、语义。

江户时代又有诠释汉语古白话词汇的“唐话辞书”。^③如濫吹子编《语录字义》1册,1694年刊行;冈岛冠山编《唐话纂要》5卷,1716年刊行;《唐音雅俗语类》5卷,1727年刊行;冈崎元轨《中夏俗语丛》5卷,1783年刊行。还有秋水园主人1791年编的《小说字汇》1册,诠释《金瓶梅》《三国演义》《平妖传》等几十种白话小说中的白话词语。

《康熙字典》问世后,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三省堂出版有重野安绎、三岛毅、

① 10卷本分为24部128门。

② 《倭玉篇》的词条由于版本不同,最多的分为542部,最少的仅有100部。北恭昭所编《倭玉篇五本和训集成》(日本汲古书院1995年版)共计3册,其中《本文篇》收录了五种不同版本的《倭玉篇》,《索引篇》则为详细的和训索引。

③ 日本把宋元后传入的中国语音称为“唐音”,把研究这方面的学问称为“唐话学”。

服部宇之吉监修的《汉和大辞典》，收字完全参照《康熙字典》，双音词和多音词取诸《佩文韵府》，编纂体例则以西方辞书为准，卷首冠有检字索引，所有单字均注音并释义，然后以字带词，从而开创了汉和辞典编纂的新纪元。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南江堂和文求堂共同出版有石山福治编的《日汉辞汇》，收录约 10000 多条词语，记录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北京官话，每个词先列日语平假名，再用方括号标出汉字书写形式，又用圆括号标明词性，然后列出相对应的汉字词。如“味”对应汉语词“味道、味儿、口味”，“悉皆”对应汉语词“全、都、所”，“朝”对应汉语词“早起、早晨”，“欺”对应汉语词“欺哄、欺负”等，还收录了“夜儿个、才刚、料估、左近、管保、溜达、定规、眨巴眼、就手儿、胡哩吗哩”等白话口语词。同年，博文馆出版有岩村成允编的《北京正音支那新字典》。昭和二年（1927 年）大连大坂屋号书店出版有权宁世编的《支那四声字典》，三年（1928 年）文求堂出版有井上翠编的《井上支那语辞典》，六年（1931 年）文求堂又出版有井上翠编的《井上日华新辞典》。诸桥辙次历时 35 年编成的《大汉和辞典》则是一部集汉和辞典大成的日中双语辞书，大修馆书店 1943 年至 1960 年初版，1984 至 1986 年修订版。全书 13 卷，以汉字立目，例证亦用汉语文献，释义用日文。收单字 49964 个，词条达 50 万。按部首分类，同一部首按笔画多少排列，字头除汉字正字外，兼收俗字、简写字以及日本的国字等，词汇包括成语、熟语、格言、俚语、诗文典故和人名、地名、官职名、年号、动植物名以及政治经济等学术用语、现代汉语词语等。注音取《广韵》《集韵》《洪武正韵》的反切为准，字形和字义以《康熙字典》为主要依据而兼释六书原义及字形变迁，大致以《康熙字典》为蓝本，参照《说文解字》《玉篇》《广韵》《集韵》《字汇》《正字通》《中华大字典》以及《辞源》《辞通》《辞海》等中国古今辞书，且充分利用《倭玉篇》《节用集》《下学集》等成果，所配插图大部来自《三才图会》。

据潘钧《日本辞书研究》，“研究编写现代汉语辞典日本要早于中国”，早在大正初年（1912 年）石山福治已编有《中国语大辞典》，比周铭山编的《国语辞典》（1922 年）早了 10 年。^① 1961 年香坂顺一和太由辰夫合编有《现代中日辞典》，

① 潘钧：《日本辞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1963年仓石武四郎编有《岩波中国语辞典》。^①1978年《现代汉语词典》问世后,香坂顺一参考《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等于1982年编成《现代中国语辞典》,并为全部单字条目和多字条目标注了词性。

此后又相继出版有《新汉和辞典》《广汉和辞典》《汉语林》《大汉语林》《中日大辞典》《中国语大辞典》《中国语辞典》和《东方中国语辞典》等。近年来日本辞书界有“汉和辞典”与“中日辞典”之别。“汉和辞典”属广义的日本国语辞典,因为汉字已是日语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中日辞典”则属外语辞典,如同“英和辞典”和其他双语辞典一样。大致而言,“中日辞典”以现代汉语为中心,与其相对的是“日中辞典”,如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日语大词典》日本版,书名即为《日中词典》。

文明间的交流常常是双向的,甚至是多向度的,日本辞书对我国辞书的编纂也有影响。如汪荣宝、叶澜编的《新尔雅》和曾朴、徐念慈编的《博物大辞典》等辞书收录了日本吸收西方新概念和新事物所发明和使用的新词语。又如《综合英汉大辞典》参考了神田乃武等编《大增补模范英和大辞典》和井上十吉编《井上英和大辞典》。

《韵府》《玉篇》《广韵》《洪武正韵》等汉语辞书在明代还传入越南。^②

明清两代随着我国与周边国家的交流日益密切,一些在中国广泛流传的通俗辞书也传入东亚,在各国传抄流通,翻刻印行,^③同时又适应各国的实际需求,进行增删改编。如日本学者柴彦辅及其弟柴贞谷参照中国杂字系通俗字书编写了《杂字类编》七卷。分天文、地理、动物、植物等十八门类,以汉字为主,旁注日文。序言称:“拓笔临纸,录事记实,卒迫之际,检寻极变,而释义的切。”^④日本江

① 1965年仓石武四郎与其高足折敷濂兴开始合编《岩波日中辞典》,主要供日本人使用,具有日汉双解辞典的功用。1994年由日本岩波书店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2001年又出版了修订版。全书共收用例6万余条,以丰富并且口语化的例句比较分析中日两种语言间的异同,使读者充分体会和区分两种语言之间在意义概念、表达方式、文化背景及思维方法等方面的差异。为便于读者理解,还对近义词做了对比。

② 参见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六南蛮“安南”条记载,中华书局1993年版。

③ 唐宋以来民间的通俗辞书等日常生活实用读物,史志多不著录,在汉字文化圈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却往往普遍流行,保存至今。

④ 柴贞谷:《杂字类编·序》,濂尾源兵卫等刊,日本泛爱堂天明六年(1786年)藏版。